

蕭山醫史叢稿

生家題

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編印

敬贈

北京中醫學院圖書館



样 本 库

蕭山醫史叢稿

周明道著

朱古亭題



1132012

目 錄

(第一輯)

- 一、素 序
- 二、蕭山醫學史略
- 三、蕭山歷代醫名錄
- 四、蕭山醫林人物志
- 五、蕭山醫籍考
- 六、後 記

蕭山醫史叢稿

周明道

序

蕭山屬古越國之邦，千百年來，人文薈萃，名醫輩出，在中國醫史上佔重要地位。惜前人事蹟，吉光片羽，星散于浩茫書海之中，不成系統，使後之學者，了無頭緒，實一大憾事。

本書作者周明道同志，為名醫華鈞璠先生高足，醫名遠播，且有志於醫學史的研究，對家鄉歷史資料尤多注意。數年來於繁忙診務中，訪古問賢，鉤沉搜遺，終於寫成此書。

吾蕭自宋高宗趙構建都臨安，迄至現代，已越八百多年。青囊春暖，紅杏茂栽，高手雲集，代有傳人，醫風醫德，力逮軒岐之本：“常以利人利物為事……，不以貧賤易其心，不以賄利動其志。”“能急人之急，濟人之困。”“學醫是為了救人，見病不救，豈非失去醫為仁術意義？”等。正氣浩然，增光祖國文明。受惠當代病家，得益千秋人民，前賢春風，惠澤臨學，誰不甘一肩挑接萬年春，使之發揚光大。學尚仲景為宗：權天地陰陽之秘，究臟腑經絡之理，辨疾病之虛實順逆，施藥劑之輕重緩急，在在發揚前賢為人民解除痛苦、延年益壽之辛勞功績，從而充實祖國醫學寶庫。並在各家治則中大多突出重點，卓識有獲，治療雜症，法簡效顯，故使困者全而危者安。

憶作者曾提出，擬將其所作《蕭山歷代名醫錄》、《蕭山醫林人物志》、《蕭山醫籍考》三部門與本書彙成一冊。果能若是，則學習有先賢，敬仰有名醫，钻研有好書，嘉惠後進，豐富史冊，更臻完美矣。

明道同志我虽识荆不远，而仰慕已久，知其生于耕读之家，热爱乡土历史，与农民有深厚感情、共同言语，医道可风，医术高明，长文笔，精著述，为我杭市地区医家中之佼佼者。本册之成，下笔準绳，语词剴切，阐前人之奥，启后学之疑，诚为我所膺服者也，樂为序之。

癸亥仲秋八十四叟诸暨袁止白

萧山医学史畧

萧山东连山阴，南傍暨阳，北矜之江，西接钱塘，纵横不过“五十里”①，是一个既长又狭的地方。但她肇域很早，源于战国②，“秦著餘暨之名，新莽以餘衍号邑，句吴③（吴越统治时的旧称）以永兴称城，经天宝而名凡四易”④。但其时还不过是一个不出名的普通小县而已。到宋天聖年间（1023—1031），有李宋卿者，来为邑令⑤。他重视农业生产，兴修水利，在西兴建起水闸，供调节水位高低之用，旱时开键，引江水灌溉农田；涝时闭键，阻止江水进入，使“永兴一带农民精耕细作的稻田，每亩可产米三斛”⑥，农民安居乐业，歌庆昇平。经过李宋卿的一番治理，萧山面貌大为改观。后来游酢（广平）、杨时（龟山）又相继宰萧。游、杨二人都是宋代大儒程颢兄弟的弟子，学识丰富，为官清廉，在李宋卿重视经济建设的基础上，创办学校，兴贤育才，给人民做了大量好事。从此，萧山人才辈出，遂为名邑⑦。而关于萧山医学渊源的历史，则文献记述不多，许多有功社会的人，考证较难，自宋以前，更属少见，只好缺如，这实在是一憾憾事。

自赵宋起，特别是赵构建都临安以后，萧山医事始载方志。如竹林寺僧净暹（晚庵），医道非常高明，尤其是妇科，蜚声遐迩。理宗皇帝赵昀的谢皇后病重，召净暹治疗，净暹用秘方治愈了谢皇后的病，“有功庭掖”，被封为“医王”。赵昀还御书“晚庵”、“药室”两匾，并作“种德种杏，寿国寿人，……建王十世，俾寿千春”的诰语赠给他⑧。所谓“建王十世”，就是净暹的前四代和净暹的后五代，总共十代，都称“医王”。

元末明初医学家楼英（1332—1400），字全善，一字全斋，博学多才，聪颖善悟。他鉴于医经医学书籍分类的欠当，特别按

人体内臟分类法，著成《医学纲目》40卷。“凡诸家之异同得失，得以触类旁通，瞭如指掌。实为医学类书中之最有法度者”^⑨。他提出：“故诊病者，必先分别气血、表里、上下、脏腑之分野，以知受病之所在；次察所病虚实，寒热之邪以治之。务在阴阳不偏倾，脏腑不胜负，补泻随宜，适其所病”^⑩。为形成“八纲”学说的先导者。（贾得道语）所以费氏《中国医学史畧》一书中提出：“但一般中医在临床辨证时，大都是根据楼英的主张，即一方面确定病的部位，即脏腑、经络、表里、气血等；一方面确定病变的性质，即虚实、寒热、风火湿痰等。这样确定了病位和病性，辨证的结论就出来了。”

楼英好学能文，兼通儒释老莊之学，勤于著作。金华名医戴元礼写给他一付联语：“闭户著书多岁月，挥毫落纸如雲烟”^⑪，可见其钦佩之情。楼英的祖父楼文僊，字元英，是金元时代一个很有学问的人。他对经史、天文、历律、阴阳、医药的著作，“靡不精研而窮其蘊”^⑫。因此楼英的巨大成就与渊源家学是分不开的。楼英曾应朱元璋之召，到明朝的首都—南京，去做过二年多的太医，后以老病辞退，继续过他行医和著作的生涯^⑬。时间迟于楼英六十多年的楼宗望，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医生，也被明成祖朱棣召至南京，“赐予甚厚”^⑭。来长吉，字德祥，也在南京太医院当过医士^⑮。可惜他们都没有著作流传下来。朱明三朝在摧毁了元朝蒙古贵族统治以后，物色了这许多医士来太医院供职，这是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。

明王朝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，极力提倡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孔孟之道来束缚知识分子的思想^⑯。儒家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医家的《内、难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被当时的儒生、医士奉为圭臬，不得异疑，否则就会给你加上“离经叛道”的罪名。但历史总是前进的，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

的，许多忠实于客观实际的医学家，在观察和治疗的实践过程中，在宋金元医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，又进一步发现了一些新规律，发明了一些新方法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而又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——四诊和八纲，并以此具体指导着临床实践。楼英是一个代表，比楼英稍晚的王敏也是一个代表。

王敏，字敏学。非常重视基本功。他认为“人禀天地阴阳之气以生，既有五脏六腑百骸之形，则有五运六气诸病之目，使之不知所以治，则生生之道或几于息矣。”^{①⑦}因此，他认为“神聖工巧，为望闻问切，望以形观，闻以声观，问以证观，切以脉观，由此求之，无余蕴矣。”他在临床治疗中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。如里中刘某，身壮热，群医会诊，都说伤寒。敏学经过症状的辨证，断为“肺病”，“遂以药下脓血而愈，众谓之神”。^{①⑧}王敏的岳父戴日新，是朱丹溪的弟子，一脉相承，渊源有素，所以王敏的医疗水平能达到如此惊人的境地。王敏的医德，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永乐甲申（1404）绍兴张经的《赠序》中说：“常以利人利物为事，切脉必探其源，药剂必致其谨，不以贫贱易其心，不以贿利动其志……”。

史宝也是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。他字国宝，“通阴阳虚实之情，闻禁方必重购之”^{①⑨}。所著《伤寒要约》、《伤寒要格》，突出了中医辨证的特点，是冲破了唯心主义思想束缚的产物。

王秉诚，字守槐，敏学的孙子。好学多思，勤奋自勉。他非常重视脏腑、营卫、经络的理论基础，继承了《内经》的余绪，发挥“天有六气，阴阳风雨晦明也，而六气为致疾之原，阴淫则寒疾，阳淫则热疾，风淫则末疾，雨淫则腹疾，晦淫则感疾，明淫则心疾，各有所受焉。原其始，求其本，要求端而疾可理也”^{②⑩}，为病因和温病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。早年悬壶湖州一带，医名甚噪，正德四年（1509）姚江胡东皋赠他的《医效序》中说：

“~~救~~治人之疾，其应如響，而判人之所不能忘也。”可见他已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，否则，是不能得到这样评价的。

时有方鲁字望山者，性质直，无城府。他论医的理论以理气为主，认为理气是疏泄肝脏功能失调的主法，它可以调畅气机，协助脾胃之气的升降，所以处方多主逍遥散加减，“恒有效，时人号为方逍遥”^②，别出心裁地为医界独树一帜。

痘疹的起源很早。清·董正山《牛痘新书》就有“自唐开元间，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”。唐代的《千金方》，宋代巢真的《坦斋笔衡》和明代的《试验方》都有关于种痘的记述，然而直到明代，医家们对痘疹的预防和治疗，还都处于探索的阶段。而魏直著《博爱心鑑》三卷^③，则匠心独运，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。魏直，字廷豹，一字桂岩，能诗，以医闻吴越间，治痘疹奇验^④。郑大志引述《博爱心鑑》的论点，立顺、逆、险三种办法，著《保元方论》，提出：“痘本于气血，治痘急于扶正抑邪”。又说：“六日以前，解毒暑加温补；六日以后，温补暑加解毒”^⑤，这就是魏氏治痘的要领。同时有王应华者，子孙三代都以幼科著称。王应华，字武桥，为人忠厚诚实，聪敏好学。能急人之急，济人之困，恂恂然有长者风，四方求治甚夥。子王良朋，字尔荣，擅内科，尤精幼科。王应华的孙子王君屏亦操儿医继世^⑥。可惜的是王应华“当时子孙秘不肯传”的著作，终于失而不传，诚属憾事。

南明时，封建王朝的统治机构日益臃肿，土地高度集中在贵族和官僚地主的手中，萧山农民与全国人民一样处在如水益深、如火益热的日子里，农民贫病交迫，疫疠流行，痛苦万状。在这时候，出现了一些施药济世的人，其中有一个出身在小康之家的楼友贞。他“研习众方，备极其妙”，以家资施药，拯救贫人的疾苦^⑦。明末清初周之冕（文伯），亦因感到当时政治黑暗，辑

弃了科举仕宦的道路，与楼友贞一样，“尝蒐岐黄术，练禁方以救时病，全活甚众”^{②7}。这种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，永远是我们值得学习的。

明朝封建王朝的残酷剥削，造成贫富悬殊，使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，农民起义如火如荼。久已在关外虎视眈眈的满州贵族统治者，乘机入侵，镇压了农民起义，消灭了南明的封建王朝，建立了清朝。由于政权初建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比较缓和，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，祖国医学也随之发展起来了。如竹林寺第三十七世僧绍鑑，法名即空，精妇科，治病多神效，在江浙两省的医名很大。他还用逐渐积累起来的医金，修复了竹林寺，于是“疾病之所向疗者，亦逐如晋宋当日”^{②8}。正如湖州府学训导楼宅中所说的：“……其披荆棘，肯堂构，皆师一人之力也。”这一时期，又有静光禅师考定《女科秘要》8卷，轮印禅师纂辑《女科秘旨》8卷，雪岩禅师增广《女科旨要》4卷，共20卷，题为《竹林寺女科秘要》（袁吉生主编珍本医书集成中名为“胎产新书”），于乾隆（1736—1795）年间出世，虽此书并非都是明代以前的原貌，有不少是后人纂入的东西，尽管如此，仍一直来不失为竹林寺师师相传的秘本。第五十一世闻坚禅师，继承妇科衣钵，求医者车相接，肩相摩。楼宅中的题像诗说他：“门前车马喧，声声疗苦难”，就不难想见当时求诊者之多了。第五十六世法禅禅师，法名果禅，妇科更为出色，致使“杭嘉湖萧绍各县缙绅家，奉之若仙。”其医道之高，影响之大，超过了竹林寺好几世的妇科，然而树大招风，名盛遭忌，邑令某公怪其不经，责令还俗。于是他著《竹林寺妇科秘要》一卷，“行道授徒，一如平日。”^{②9}因为他俗姓范氏，故人称范和尚云。

张榭堂，字应椿，为乾隆间名医，博学多闻，钻研医理，治

疗疾病，每有出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和效果。在学术见解方面，例如中风的“中”字，他认为当读平声，论点是“中虚则气亏血热，风自内生，与外感不同；惟猝中之‘中’，读作去声，其风由外入，法不可治。”这是很转辟的论点。相传有西兴戴某，双目忽瞽，百治无效，请张榭堂治疗。张说：“你的眼睛是因倾跌而失明的吧？”病人回答说是。张说：“容易，请你袒背面墙，以两手拄墙而立”，张榭堂按穴击以拳，“只应声而复明”^③。他的治病，大多都是这样神妙。现在老年人还仍在传颂他，可惜他的著作没有传下来，他的学业亦没有人继承。

俞在兹，字文起，一七二〇年以前在世，博闻强记，洞明医道，用药如神，治疗辄愈。故《萧山县志稿》说他“名播江浙间”。来鸿雯说他“萧山富贵家奉之如卢扁”^④。康熙辛卯，萧邑瘟疫大行，文起解囊施药，全活甚众，人皆德之”^⑤。

嘉庆乙丑（1805），米珠薪桂，饥荒大作，农民贫病交作^⑥。有瞿广陵，字银涛者出，存心济世，生枯起朽，“有延诊者，无论严寒酷暑，必徒步往视，并不受值，受医者每转危为安”，^⑦时人德之。

这一时期有一位楼宗谦者，善治妇科和儿科^⑧。他特别强调阴阳和虚实，与明代楼英的主张相彷彿，猜想可能就是楼英的后代。

蔡鹤，字松汀，擅长产科，著《催生验方》、《难产方论》行世。虽不是巨编大著，其理论却颇有大家风味。他在《难产方论》中提出的学述观点是：“产以气血为主，气足则易于送胎出门；血足则易于滑胎落地，若忍痛久，则伤气而气不足，下水多，则伤血而血不足，产何能下。”故制“大补气血于临产危急时，无论产妇平素气质强弱，胞衣已破未破，急以此方连进4—5剂（原注：不必服二剂，以力薄也），则痛可立减，而胎自顺

下”。而且，“试验已久，百无一失”，曾得到当时医界的重视和好评。

又有汤元凯（辛阳）者，性真挚，能诗善文，兼擅绘事，幼抱废疾，不利于行，自称“枯道人”。医学造诣很深，对“疑难症，医治辄效”。病人求诊则随到随治，即使很忙，他亦毫无怨言。他常说：“我学医是为了救人，见病不救，岂非失去医为仁术的意义？”风格之高，可以想见。他不慕荣利，自己的著作，随写随散，不事收拾，所以亦没有著作流传。^④

在外科方面，陈锡灿（星占）著《青囊佳绳》二卷，《痈疽虚实寒热辨》一卷。内服汤剂，重点从八纲方法分类，新颖悦目，简而有要，到现在还称得上是一部外科的必读书。他在凡例中写道：“证候传变，难以言尽，而其要不外乎阴阳分。言之即表里寒热虚实。良医之救人，不过能辨乎此；庸医之杀人，亦不过错认乎此。”^⑤正阅历见道之言。在药物外敷等外治法方面，基本采取了清洗疮口，脓肿引流等正确措施。对外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榜样。

萧山儿科也相当发达，其中要数孔氏为代表。孔熠字子明，道光间以儿科名家。四方之来就医者，不绝如缕，当时有“再世盧扁”之誉。^⑥孔传熊，字兆占，医名闻遐邇。他每遇一症，必虚心体察，斟酌下方，不敢以人命之存亡，试药之效否。故数十年门庭如市，著手成春。但他们都忙于临床，无暇著述，医案亦未见后人整理，深为可惜。^⑦

在孔氏儿科世家中，孔继林（杏瞻）是一个很讲医德的人，他不但有“活人之疾，其应如响”之高超医术，而且“不计其报”，群众称赞他“有古君子风”^⑧。孔继康（醴泉）年近不惑，术益精而道益行，并且乐善好施。对贫苦病人，“不惜罄囊而与”。他写《活幼篇》的自序中说：“欲救人而学医则可，欲谋利

而学医则不可。……若苟无良心，则终日矜名计利，奚暇精研此中义理哉。”仁人之语，实堪万世师法。后辈孔广训，字双桥，身弱多病，继祖业精研医理，但求诊病人稍逊他的祖辈。所著《双桥活幼心法》，内容如何，未曾见过④。

他如瓮山的施若霖（1823-1851），“幼颖异，性乐善”，在“习盐业，精于核算”的百忙之中，给会稽和高法名青莲的笺注《眼科必效录》4卷行世。这是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眼科参考书。施若霖又自辑《伤科纂要》36卷，没有刊行，后燬于兵火⑤。

陈光淞，字根儒，号赞道人。1857年前后在世，萧山滂湖村人，官江苏候补道，晚年著有《温热论笺正》，古吴曹沧洲部郎给他写了序言。（见裘氏《珍本医书集成》）“根儒本不业医，惟好研岐黄之学，于温热症阐发更精。其笺正叶氏《温热论》有独到处。间有纠正王氏《经纬》、吴氏《条辨》甚多。”⑥一八九七年三月，我县“喉疫流行，医多束手”，（《喉症要旨》跋），根儒又著《喉症要旨》问世。“本仁者之言，为救世良方，则造福无穷矣。”（见曹岳镇《喉症要旨》序）

汤鼎燴，字章甫，清道光年间的举人。他也是读书而不业医，可他喜欢岐黄之学。当1841年（道光21年），柬乡瘟疫盛行⑦，小儿麻疹死亡率甚高，汤氏出于一片济世之心，邀请了一批县里较有水平的医生，辑成《麻疹济世集》，成为儿科医生必修课本。其中有不少新见解，曾得到人们的好评。

道光四年（1824）陆成本编刊的《经验良方》，1844年，萧然居士（姓名待考）辑刊《葆元集》，同治壬申（1872）又得萧山怡怡山堂（姓任，名待考）重刊⑧。他们自己都不是医生，而都在医学上作出贡献，诚如任应秋教授说过：“看来秀才在医学中搞科研是大有可为的。”⑨确实如此。

黄镐京者，字遽甫，父子三代都以业医名世。父亲黄维熊，字太占，咸丰时考不上举人，“乃伏案诵读，发愤忘食，深夜枵腹苦攻，遂成肝病”^④。于是弃儒学医，不仅治好了自己的疾病，而且悬壶济世，医名很大。著《太占瘡科要畧》二卷，八论、三十六条，为儿科痘疹作出了贡献。黄镐京本人笃信好学，专心医药书籍的搜览。“行道五十余年”，学验俱丰。著有《镐京直指医方》、《医学程式》、《六淫辨症》和《四时温病》等行世。他的儿子黄裳，字元吉，聪明好学，温故知新，求诊的病人也很多。所著《元吉危症验方》，都是他疑难险证的临床病案，辨证用药，有独到之处，现在仍然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可惜他劳心过度，盛年早夭，未能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一展其才为憾。

徐橘仙(1855—1901)字葆仙，清末恩贡。他的母亲患内障，双目失明，因此下决心搜罗古今眼科医书，苦读了几年，治好了他母亲的内障。于是又习内科，日积月累，在医学上达到了较高水平，出世济人，疗效卓著，人称“医仙”。后来他的子孙迁居钱清，以医为业，一直得到舆论的好评。有医案，惜燬于十年动乱中。

在清末民初之间，萧山有孔广昭(普庭)，孔广宾(志軒)者出，这两人深受清王朝思想统制之影响，一向规行矩步，一心扑在医学事业上，专攻儿科，为后一代的保健事业而忘我劳动。他们门庭如市，应接不暇，凡经其手者，沉痾立挽，白骨生春，被人民称誉为“万家生佛”。孔广昭在他的《儿科参要》一书中提出“急惊为痰火闭证，慢惊为木侮土证。”为我们治疗急、慢惊风提出了新的准绳。

邵兰荪是近代著名医家。“精内科，学识名誉，与绍兴何廉臣相同。生于清同治末，卒于宣统初”^⑤。按：(邵兰荪生于咸丰乙卯(1855)，卒于宣统庚戌(1910)，终年五十五岁)。他世居

萧绍间的杨汎桥（今属绍兴）。天分很高，幼年喜医学，发奋自学，后来又得钱清名医王馥源的指点，重点研究《临证指南》和《医学心悟》二书，久之学有心得，颇能神明变化。^④他是以走自学之路而达到了高度成就的一个代表。平生忙于诊务，无暇写作，自己只写了《喉症经验方三条》流传于世而已。

谢光昱（1857—1927），字旦初。“幼而失怙，奉母至孝。早年屡试不第，乃专心轩岐之学。对于内外各科，无不精研。廿八岁后，母故，乃迁杭州开业^⑤。”创大方伯医院，开设内外科门诊，治好了不少疑难证，名扬江浙两省。四十多年中，因业务纷忙，无暇著作，现仅存一些医案而已。他的儿子谢寿田，继承父业，曾任上海市同济医院中医部主任医师^⑥。

潘星如（1875—1934）者，是绍兴名医王馥源的入室弟子，医学造诣甚深，而对温热病则尤称擅长。他初行医时，无人过问，生意清淡，曾受到当地药店商人的冷嘲和热讽，生活极度困难。这时候他住在城厢东隅桥边的一间小屋里，靠他母亲和妻子的纺纱收入维持生活。于是继续焚膏继晷，刻苦读书，终于医名崔噪，名重一时。其时正值清季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，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。不久，辛亥革命爆发，这一革命在表面上推翻了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，然而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并没有丝毫改变，军阀割据，土匪横行，医名隆重^⑦的潘星如得不到人身安全的保障，于1926年逃出萧山，避居杭州开业，诊务仍然很忙，“杭人至今称颂之”^⑧。

同时有华钧珊（1878—1961）者，字壶隐，举光绪壬寅（1902）孝廉。好学能文，博学多才，与潘星如一同避难杭州，相知为友。华钧珊祖上六代，都是由儒而医，学验俱丰，对疑难证，治多奇效。如“吕某除面部外，患全身肿满，青筋绷急，大小毕见。自述胀无所苦，所苦者绷急之痛，有如绳缚。服逐水药不效，邀

余诊之。按脉则沉细而滞，非温之必不能愈。先用十枣汤服之，不效。次日嘱其购巴豆一斤，煎汤浴之……，浴时觉闷苦，绷急之痛者至此无可言状矣。浴后一炊许，倦极思卧，卧醒登厕，所下水约二斗，其水中有五色片，薄如茧纸，其病顿失，旋用平胃散治之④”而愈。如不是见证之确，胆量之大，是达不到这种惊人疗效的。子然青，名照葵，1926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有医名，民国时候的《浙江中医杂志》经常有他的文章发表。

孔庆莱字蔼如，(1886-?)。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，得化学学士学位。回国后，应商务印书馆之聘，编辑《化学》。因身体孱弱，才钻研医学，卓有成效。1926年前后任教浙江中医专门学校。他很尊重徐灵胎的学说。重视八纲辨证，也重视灵活用方。辨证要准确，用药须适当。他在1920年校勘印行《大生要旨》中，反对“以一定之死方，治万人之活病”。他在慢惊一证中的论点是：“阴泄于下，阳越于上，每见发热唇红苔黄等候。如以假热真寒，视为真热，犹之假寒真热，误作真寒，其祸均烈。故辨证务须审慎详细，审证既确，用药必专，否则仍无济也。至方剂，莊在田之用理中地黄汤，王清任之用可保立麤汤，李东垣之用参芪保元汤，喻嘉言之用参芪朮附汤，方味稍异，方义畧同，参芪朮姜桂附归地等味，随症轻重，量为出入可耳。桂附劫阴，得效即止，慎毋过剂。”实为名论。他晚年又写了一本例举西药误治，而经过中医挽救复生的病案，名之曰《诊餘痛言》，是针对当时反动政局废弃中医而发的著作。可见他对祖国医学的热爱之忱。其门下士陈道隆，(字紫宇，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毕业)鄞人，住杭州六克巷。行医上海，亦有医名。

蔡脚(1877-1945)，字东藩，一字椿序。是民国初期一位杰出的历史^学家和演义作家。他感于一家兄弟姊妹的天亡，生離死别的痛苦，才萌发了学医的念头。后来又得到我县著作等身的著

名医家，他的岳父黄儒京的指点，聪明透顶的蔡先生，就学会了医术，并且给人治病^⑤。晚年又著成《内科临症歌括》4卷。揣摩其学术观点是，既重视人体的气血，又重视肝阴，认为它们是推动和维持人体生命的动力和源泉^⑥。作为一个演义作家，出于他救人济世的长厚之心，为祖国医学的发掘和普及工作作出了贡献，这种忘我无私的精神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

施今墨(1882-1968)，为北京近代四大名医之一。他“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，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。后以宦海浮沉，遂弃政专以医为业。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汇通，尝谓：‘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汇通，始能究明真理’。一向主张中医辨证，西医辨病。辨证辨病相结合，总结疾病规律，才能取得古人理论精华，指导临床实践，因此独创一格，医名大噪。”

“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，施先生到处奔走，联络各省医家，数次请愿，与国民党当局力争……，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……。”解放后曾受毛泽东主席接见，又受敬爱的周总理关怀，并被聘为北京医院顾问，主持中医会诊。晚年研究冠心病，消渴方，平稳有效，为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。

瞿绶云(1883-1962)，后改宪文。戴村區大橋村人。他出生在一个以开中药铺营生的小康之家，思想进步，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很强。当时在汇通中西医的学潮中，他学习西医，希望为祖国医学发展起些作用。后因军阀混战，土匪横行，民不聊生，瞿绶云目击心伤，义愤填膺，在苏联十月革命影响下，于1927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为摆脱中国人民经受千百年来屈辱和痛苦迈出了第一步。1933年创建萧山医院近十餘年^⑦，在以医为业的掩护下，为党做了不少地下工作。后因身分暴露，被当局追捕，绶云离开萧山，逃往延安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中央卫生部

—14—